

漫谈王芳越界

□ 毕星星

我的印象里,文学圈和戏曲圈这些年接触和交流很少,大家似乎都信守着一个“井水不犯河水,互不越界”的规矩。前几年我写过一部关于《三上桃峰》事件的长篇纪实文学,按说这是山西戏曲界的大事件,但是发表以后,戏剧界没有任何反应,倒是文学圈的朋友见了致以祝贺。这个也说明,只要是文字类型的成果,戏曲界一般就认为与自己无关。

文学和戏曲界之间,有一堵高大的防火墙,王芳是一个大胆的翻墙人。我不敢说他是三晋第一翻墙人,但如此大规模的翻墙越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文学和戏曲这两种艺术样式,其纠缠不断的关系,在历史上并不鲜见。早在晚清年间的山陕梆子时代,识字人就显示出他的理解表演的长处。当时的演艺人大都是苦出身,不识字,山陕梆子的名角郭宝臣,少见的早年开蒙,成人以后又喜欢和当地名士过从,对理解戏文大有裨益。他熟悉经史古典,遇到不通的唱词,立刻自改自唱。相传他与齐如山对坐切磋演技,有一句台词“西风起雁南飞杨柳如花”,和剧本的整体气氛明显违和,议论起来,郭宝臣说,你唱错了,那是——西风起雁南飞远林如画。郭宝臣这样的文字理解水平,在当时演员中如凤毛麟角。他能唱好戏,不是没来由的。

近代京剧大师背后都有一个文化人,如梅兰芳之于齐如山,许姬传,程砚秋之于罗瘦公,山西蒲剧名角王秀兰、阎逢春背后的李逸僧、薛绍生。这样的珠联璧合,才有大家的风生水起,如日中天。

王芳的《天地间一场大戏》的首发式很是亮眼。首发式之后,山西各地陆续开始呼应,从大同到长治晋城,戏曲和文学的爱好者都在热传王芳的书。这个《天地间一场大戏》应该是两界的一个重大收获,一个烧灼的闪光点。

《天地间一场大戏》的声浪响起之后,我也听到过一些别的声音,质疑王芳的跳腾。主要是说,王芳不懂戏曲,是个外行,一个戏曲圈子以外的人指手画脚,显得傲气凌人,不见得能说到点子上,等等。

王芳不是外行?说外行的,太不了解王芳的作为。《天地间一场大戏》里,王芳不但写到了晋剧,还写到了山西多种地方戏,一直到大同耍孩儿这种很生僻的小剧种。王芳多次跟着剧团下乡考察,对剧团的历史现状有深情的观察和体味。她跟团下乡,和演员们一起吃农家饭,一起滚汤铺,混出深厚的情谊。要说她了解戏曲的当下,这个真不是夸张。

《一场大戏》出版以后,王芳继续推进她的山西戏曲考察,她带了一个团队,先跑山西南部,挖掘寻找那些即将失传奄奄一息的幸存剧种,比方运城的水滸道情、万荣清戏、芮城线腔、夏县蛤蟆嗡,这些古老的宝贝,已经很少有人问津,再不抢救,很快就将杳无声息。王芳挖掘这些活化石,既是打捞遗产,也是纵身一跃走进戏曲史的重要修炼,是她的自我完成。

我建议我们山西闹地方戏的专家们,要跳出晋剧看晋剧,跳出蒲剧看蒲剧。王芳不但研究山西的地方戏,她和全国京剧话剧圈子也建立了亲密的联系,像北京人艺的濮存昕,北京京剧圈子里的于魁智、李胜素,天津的孟广禄,与王芳都有结交。山西京剧团名角张智和张巍,山西的民歌歌唱家,王芳更是熟悉。跳出晋剧看晋剧,这样让王芳具备了一种全局的眼光,她有可能从兄弟剧种比较借鉴,也可能清楚地看到山西戏曲在全国的排队占位。地方戏这个群体文化程度较低,往往以区域个性为借口自我封闭,这个自然保守了一地传统,也容易固步自封,关起门来称大王。对于戏曲界的新变化,王芳也在密切关注着。她曾经千里跋涉,跑到江西赣南,为的是看一回张曼君导演的专场演出。我还是从她的嘴里,才得以知道张曼君导演的新思维。白燕升的戏曲电视大制作打进山西以后,她也曾经和白家的班底合作,做戏曲电视撰稿,尝试给古老的戏曲艺术插上新生代的翅膀,这个属于戏曲和影视的嫁接联姻。联络新媒体,跟踪新动向,所有这些越界又越界,我以为,王芳总是意图站到艺术的前沿阵地,以鸟瞰的目光在兄弟艺术形式之间自由行走,对于山西的地方戏,王芳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存在。

戏曲作为一门古老的艺术,谁来记录它曾经的闪光,谁来记录它眼下的没落?谁来期许它未来的再生?地方戏格局就更小一些。现在终于有一位山西作家来记录,这里面是否有些值得思考的东西?

在山西,文学和戏曲曾有过很好的合作。在早期的山药蛋派作家时代,作协与戏曲结缘是很深的。赵树理经常给上党梆子剧团写戏排戏,马烽在西戎当家的年代,作家协会和戏剧戏曲的交道也是很多的,他们的小说多次改编为戏剧电影。马烽和孙谦更是多次合作,执笔写过多部电影剧本,那时的山西,小说电影,都是他们一伙“山药蛋”的事情。上世纪70年代马烽老师还参与编剧一出现代戏《快马加鞭》。进入新时期以后,文学和戏曲明显脱节疏远。

我也是一个戏迷,但是我多次给戏迷群体强调过文学的强势地位。文学入侵戏曲领域,攻城掠地,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文学以语言作为传播工具,语言的普适性,也为其入侵其他领域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我们经常看到,一出戏拍成了,请作家们去看,看头论足,可有谁见过,一个作家写了小说,拿到戏曲圈子里去问长问短,那实在罕见。

这一切当然也在变化。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业内人士热切感到了文学和戏曲这两个兄弟艺术之间的亲密,大家走动逐渐多起来。别的不说,在省城,作协一班老作家和以谢涛为首的新编晋剧一派之间的艺术互动越来越多。作家们想从兄弟艺术感受一种表现灵感,戏曲家们也想听一听作家更多的思索和见解。谢涛对晋剧的人文价值,谢涛演唱的艺术追求,被一批作家深度挖掘,呈现出新的思想文化品格。戏曲和文学两家更多的融合交流,生成一道新景观,两个圈子的相伴互补,共存共荣,彼此向对方汲取艺术养分,亲密无间。

王芳从小深受地方戏曲的浸染,待到有一定的文字修炼,回过头来写一写自己钟爱的戏曲,再正常不过。到太原这么多年,王芳的眼界逐渐开阔,表现手法也逐渐成熟。在林林总总的大千世界,目不暇接的题材丛林,王芳选择了戏曲,无疑是一次成功的越界。

王芳还不算一个大作家。一个小作家的越界,就给了我们这么多想象和鼓舞。山西新一代的作家,已经开始重新审视文学和戏曲的密切联系,影视这一块已经明显在做大。这是否标志着一个新的格局新状态的诞生?

文学和戏曲,各自做好自己的本分之后,不妨也到邻家的园地看一看转一转,甚至越俎代庖地耕耘一番。脚印也许是歪歪扭扭的,在大家友好的笑声里,那不是蕴含着更美好的期待吗?

疫情下的拉脱维亚

□ 梁宾宾



日头西斜,天色渐暗,眼看着在光照的作用下院子里的草坪和邻家的院落、树木、花草由翠绿幻化为暗绿、灰绿,直至灰色。

抬眼望去,对面红房子的门楣亮起了彩灯,天边的红霞渐渐褪去,最终消失在苍茫的天际。

当远近错落的房屋由“实体影像”演变为沉重的轮廓,我下意识起身关窗,拉上窗帘。看墙上挂表指向7点30分,这就是拉脱维亚3月里大自然的时间刻度。

新的一天接踵而至,生活周而复始。手里操作着没完没了的家务:洗衣做饭,打理花园。种花除草,给植物浇水施肥,完成写作中的稿件……日复一日的的生活显得既不真实,也不可靠。

窗纱的褶皱遮住了我大半的视野,同时也把我隐藏在暮色中。明亮的玻璃窗,将我于冷空气分割于内外两个世界,重要的是把新冠病毒拒之窗外。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这个被病毒侵袭的冬天,寒冷而阴郁。

然而,我们的等待到目前为止仍显得遥遥无期。女儿按照学校的规定如期开设网上授课,指导研究生。

在国内疫情严重的一二月份,我无心打理眼前的生活,那是在异国他乡度过的异常寒冷、不知所措、心神不宁的冬季。下午4点天就黑了,我们在黑暗中等待天明,时刻关注着国内的疫情。然而与日俱增的死亡数字让人胆战心惊,当人们毫无抵抗能力面对这场灾难的时候,无助、无奈和痛苦的袭击是自身力量无力抗衡的。

随着时间推移,国内疫情渐趋好转,我们还没来得及做回国的准备,疫情已经突破了欧洲的大门,继而我们重又陷入了悲情中。

法国、意大利、德国、巴西、美国……死亡人数一路飙升,人类在自然界的生存能力显现出他的脆弱和卑微,我感觉心智的尊严再次遭到了重击。

这个世界怎么了?从几千、几万,到几十万、上百万!无辜的、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转瞬即逝。在宇宙面前,一天天攀升的死亡病例只不过是一组冰冷的数字。

由于新冠病毒的肆无忌惮,这个世界已经难以分清彼此,病毒面前,已经没有“你们”“我们”之分,没有了国内国外、朋友敌人、高官百姓的界限,而是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灾难!

谁曾想到,宇宙突然变成一副陌生的面孔,将灾难降临到整个世界,改变了每个人的生活状态,让人类不得不屈服于他的脚下。

这让我瞬间明白,夏洛蒂·艾米莉·勃朗特姐妹怎么会借助大自然的力量去描述种种非此不可言表的难平心意。

出路似乎只有一条,全人类结为同盟,同舟共济。

风静静地掠过草坪,吹来风信子的阵阵花香,除此以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从4月

音乐和歌剧。

新艺术主义建筑大多集中在里加市中心 Alberta 街和 Elizabetes 街这两条街道上,街道两旁伫立着造型优美的艺术建筑,尤以建筑外墙和门面上镌刻的人脸雕塑为世界所瞩目。一张张表情夸张的面孔,或惊异、或痛苦、或严肃、或微笑、或沉思、或沮丧,而无论如何他们都具备了同一个特点:他们是优美的、逼真的、摄人心魄的!如果遇上雨天,他们无一例外地在屋檐下流泪哭泣,如果赶上晴天,他们的神态便愈显生动。

疫情并没有给拉脱维亚人带来太多的影响,在欧洲国家里,拉脱维亚的新冠病例最少,户外不曾见人戴口罩,平日人们只是减少了出行次数。复活节前,旁边那家年轻妈妈带着她的儿女们为院子里的苹果树挂上了复活节彩蛋(彩蛋的原始意义象征着“春天和新生命的开始”),风中跳跃的彩蛋为疫情中沉寂的春天带来了一线生机。

复活节那天,我发现门边放着红、黄、蓝三盆“三色堇”。翻阅室外录像记录才知道是对面邻居送来的。她把鲜花整齐地摆放在门边之后悄然离去。

平时我们见面只是简单问候并无更多往来。中国疫情最严重的2月,遇见我们时她主动问好并问候中国,表示祝愿中国早日摆脱疫情的威胁。眼下欧洲疫情惨重,他们赋闲在家隔离,不便当面道谢。于是我女儿用以前画画剩余的丙烯材料画了几只复活节彩蛋摆在窗台上,默默致谢,祈愿彼此平安。

由于拉脱维亚疫情期间政府部门停止了对外办公,封闭了国家边境,大部分人工工待业。寂静的马路上跑着各类商家的送货汽车,我们也只能依靠送货服务维持着居家生活。截至5月19日,拉脱维亚依然没有解除抗疫紧急状态。

拉脱政府发布了新的防疫规定:封闭国家边境至2020年6月9日;在公共场合聚集最多不得超过25人,且人与人之间须保持两米距离;公共交通运输人员须戴口罩出行。

转眼就到6月,欧洲传统意义上的度假季即将来临。人们期盼着走出家门,去迎接和往年一样崭新的夏天。(图片摄影为赵之昱)

开始,每隔半个月,女儿就用锄草机推一次草坪。农庄式的生活情调给我惆怅的心情奉献了些许慰藉。

如果没有对亲人的牵挂,没有疫情的威胁和对疫情的疑虑,日子将会是另外一种模样:随心所欲地安排生活,尽享美妙的四季。自由出入各个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尤其3至6月,我们将迎来一个美妙的春季。

5月的夜晚,艳阳高照,天色如白昼一样明丽。多彩的天空为欧洲漫长的白夜增加了几分情趣。大片灰色的云朵镶着金色的流苏在天空中舒展、闭合、游离、聚集。

或许正是不得已而驻家中,只能面对花园草木,展望邻里的庭院草坪、生活小景,才得以全身心地投入方圆内目力所至的生动景象。面对屋前的薰衣草、遍野的蒲公英,面对远方的原野、变幻莫测的天空和可望不可及的云彩,欣赏沧桑古木、一树繁花、云卷云舒、雨雪阴晴……

拉脱维亚有着多样化的自然风光,广袤的森林、大沼泽和郁郁葱葱的草地,还有尤尔马拉长达500公里的海岸线、白色的沙滩。

首都里加被冠以“北方小巴黎”的美誉。里加的历史中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最能代表拉脱文化实力的是中世纪古镇和新艺术主义建筑,世界级的古典



麻溪的读书梦

□ 张雄文

能读得起书,甚而出一两个大学生“光耀”家族,曾是老家麻溪村长久的梦想。

麻溪是资水凿穿雪峰山余脉大梁山后,欢然接纳的一条小河,柔婉而清浅,像山间带着浅笑的某位采茶女子。与资水相接处的两岸,1300多名张姓村民聚族而居,村子也因小河而得名。小村从无到有,有文字可考。族谱上记载,明初朱元璋下旨“江西填湖广”时,先祖遵公从江西泰和县悲悲戚戚迁至湖南新邵的山岭间。他的十世孙德祐公于1320年偶然途经山苍水碧的麻溪,掬水而饮,甘冽异常,心乐而携家迁居于此。近700年野草般的繁衍,渐至成一大村落,早先属湖南新化县,后因行政区划调整,转隶冷水江市。

族谱上早已化作两岸泥土,仅有冰冷名号的先人们,除了清代出过一位举人玉竹,其余多是白丁。玉竹仅仅中举,并无官身,却成了村里祖祖辈辈最大的荣耀,也是打我记事起,爷爷常常激励我的标本。

爷爷大字不识几个,却总诫勉我多读书,说“算盘子打得将军死”。童年的我颇不解:将军手中有刀剑,至少还有拳头,怎会被区区几粒算盘珠子打死?爷爷答不上来,只固执地说记住就是了。多年后我才明白,能拨算盘子的人,都是诸葛亮、刘伯温之类的读书人,无怪乎能让孔武的将军殒命。

我疑心爷爷是想让我圆的读书梦。他生于1905年,到了上学年纪的1921年,遭遇大旱。(《新化大事记》载:“县民以草根、树皮、白泥(俗称‘神仙土’)为食者甚多。阳峒、虎寨等地油栗树皮均食尽。县城街头悬标出卖儿童,‘斤价八十文(铜元)’.县署发逃荒护照,首批560名饥民相继出逃逃荒。”匪患也随之猖獗:“罗洪村刘丹桂3岁幼童被‘吊羊’,无钱赎回,幼儿遭烹杀。是年,县内盐斤价,民多淡食”。第二年,“县内米价昂贵,每斤价二百四十文”,“全县饥民逾40万人”。

除人祸天灾外,村里无任何学校,即便小学也要到近五十里外的县城才有。这又非家境窘迫的爷爷能上得起,他便只能在对玉竹荣耀的歆慕

里长大,和村里其他人一样,与锄头、扁担摩挲了一辈子。

接了爷爷衣钵,想让我圆梦的还有父亲。父亲生于1942年,到了可以上学的1947年,“县内米价飞涨,大米每升由月初12万元(法币)涨至20万元”;1949年6月,“大水成灾,全县淹田十万余亩,资水陡涨,城南福景山田垌一片汪洋”。

幸而两个月后,新化和平解放,解放军147师裹着浩荡秋风开入县城。爷爷很快被选为村农会主席,从替人佣工的“扶犁黑手”变成了“把印”的干部,似乎比当年没有实职的玉竹还风光。但没多久,因不识字,他看不懂书报文件,连手中大印的正反都总弄错,只得主动辞职回了家。

这时,天地翻覆,万象簇新,十几里外的大同镇(现为新邵坪上镇)上破天荒有了一所完小。父亲便背着奶奶用破旧蓝印花被单赶做的书包,连蹦带跑上了学。不过,他每天早晚得割草、放牛、下田,乃至跟着人挑脚,去附近的金竹山煤矿挑一担煤到麻溪码头上装船,换取几分钱脚力费贴补家用。几年后,县城的初中时,父亲和村里的同龄人一样,被硬生挤了下来。到了20来岁,已改为国营的金竹山煤矿招工,他成了一名机电工人,一直干到退休。

与同龄人比,父亲还是幸运的,终究撇弃了爷爷递过的锄头,吃上了“皇粮”,还凭着几年上学的

基础,渐渐掌握了电工技能。他的同龄人多半只好待在村里,重复着先祖们侍弄黄土的原始生活。

到我能上学的1970年代末,村里有了小学,往昔肃冷的张家祠堂则被改成了一所初中,同一公社附近几个村的子女都可来上学;冷水江已从新化划出,单独建市,远远近近也有了三所高中。村里家家重新燃起了读书梦,渴望出个大学生。父亲给公家做事,见过世面,也尝过苦楚,期望我考个大学的念头尤为强烈,规定我课余时间不用割草、放牛,只需每天给家里挑担水就行。他每每回家,第一件事便是查阅我的作业。有天深夜,他从外地到家,我碰巧醒来,听见了隔壁房间他与母亲的说话声,第二天清早便急急爬起来,取过书本高声朗读,装出很努力的样子。父亲悄声过来,又满意地退了出去。

我们村第一个实现梦想的是村里的堂哥。他在1986年双抢时节,收到了湖南师大的录取通知书,似春雷陡然炸响,一时轰动麻溪河两岸。他家当天便杀猪宰鸭办酒席,晚上还放了一场很稀罕的电影。村里大人匆匆洗净手脚的污泥,纷纷前往道贺随喜。一连几天,他家门前都如城里喧嚣的集市,超过了任何一场平常喜事。父亲也是其中几回登门的一个,但惟独不许我去看电影,说待在家读书。

其时,我刚上高一,村里同龄人因招生名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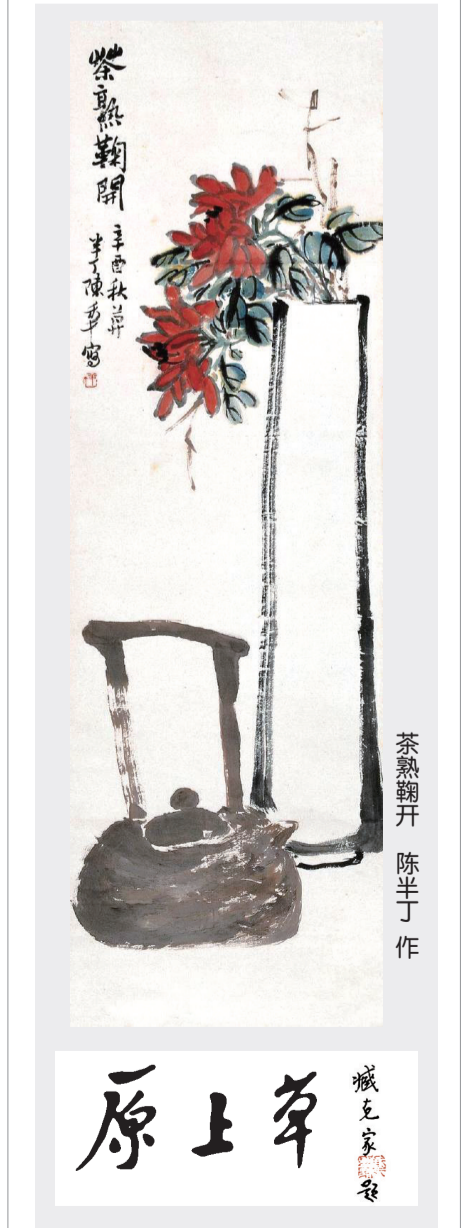
有限等缘故,多半已被淘汰在半道的初中。堂哥的风光,令我第一次直观感受到了读书的荣耀,远比多年来遥远而朦胧的标本玉竹要强烈。此后,我再不曾在父母面前装过勤勉,而是真切接过了爷爷与父亲的梦。

3年后,我终于也收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当年的录取率仅有22%,我不只成了家里和村里足以喜泣沾襟的圆梦者,还是全市不多的“春风得意马蹄疾”者之一。这时爷爷刚辞世一年,没能看到这荣耀的一幕;父亲虽没有替我办酒,但走在村里那种倍受羡慕的荣光与喜悦,至今犹在骨髓。带着这份荣光,我从此别离了故土,远赴外地工作近30年。

而今,麻溪早已焕然一新:娄怀高速穿村而过,家家建起了别墅般的簇簇新房,将澄碧的河水装饰得色彩斑斓;户户通了柏油马路,接上自来水,装了路灯,既有城里的方便,又能亲近自然;市长亲自蹲点村里,潜心创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农村;麻溪河原本凹凸斑驳的两岸,修起了姿仪绰约的风光带;一座坍塌多年的松木结构风雨桥,重新蹲踞碧波之上;老辈人记忆里的青石板麻溪古码头,也像刚从地底出土,恢复如初……

最令我欣喜的是,村里还添了一所设施齐全的公办幼儿园,儿童不再像我懵懂的当年,只能奔跑在田间捉蜻蜓、玩青蛙、戏蚂蚁。小学、初中则与全国别的地方一样,实行“强制性、免费性、普及性”义务教育,再无适龄孩童像祖父辈那样辍学在田间地头劳作,过早背负生活的重担。随着大学录取率的逐年走高,读大学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新修的《麻溪村志》记载,从堂哥开始,村里的大学本科生已有127人,其中研究生22人,多半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晚辈。

我回老家的频率渐渐高了。回家的日子,徜徉在麻溪河杨柳青青的岸边,听清风传来大小校园的琅琅读书声,看乡邻们在村里广场怡然健身或跳舞,我似乎看见了河水映照出先祖们一抹抹霞光般的微笑……



茶熟翻开 陈半丁作

原上草

陈克家